

商人与杭州

早期现代化研究

Research on Businessman and
Early Modernization of Hangzhou

尹铁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商人与杭州

早期现代化研究

Research on Businessman and
Early Modernization of Hangzhou

尹铁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商人与杭州早期现代化研究 / 尹铁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8-13838-3

I. ①商… II. ①尹… III. ①商人—影响—社会发展
—研究—杭州市—近代 IV. ①F729.5②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0320 号



责任编辑 赵博雅

封面设计 北京春天书装图文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40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838-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成果(A11LS02)

目 录

绪 论 近代杭州商人的崛起	001
第一章 商人与近代杭州工业化进程	011
第一节 杭州近代工业发展概况	011
第二节 近代杭州工业的特点	029
第三节 近代杭商企业经营管理特点	044
第四节 商人与近代杭州商业转型	051
第二章 近代杭州商办新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072
第一节 商人与近代杭州轮船航运业	073
第二节 商人与近代杭州铁路交通建设	085
第三节 近代杭州商办公路交通	099
第四节 商人与杭州传统邮驿业的近代转型	110
第五节 近代杭州旅行社与旅馆业	115
第三章 商人与近代杭州金融业	117
第一节 杭州近代商办银行业	117
第二节 杭州钱庄业的近代转型	145

绪论：近代杭州商人的崛起

本书中的商人，是广义商人的概念。根据民国初期颁布的《商人通例》，所谓商人，就是“商业之主体之人”。所谓商业，包括：“一、买卖业，二、赁贷业，三、制造业或加工业，四、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五、出版业，六、印刷业，七、银行业、兑换金钱业或贷金业，八、承担信托业，九、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十、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十一、堆栈业，十二、保险业，十三、运送业，十四、承揽运送业，十五、牙行业，十六、居间业，十七、代理业。”“凡有商业之规模布置者，自经呈报该管官厅注册后，一律作为商人。”^①这里的“商人”，实际上包括近代与市场密切关联的所有工商业投资者与经营者。本书中的近代杭州商人是个地域概念，指在杭州经商的杭州籍商人和寄籍杭州的外地籍商人。据吴承明先生研究：“原来贩运商人属于客商，到交易城市须投行。明代大商帮兴起，已不尽是客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卷）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168页。

商,而常挈眷在交易城市占籍。入清以后他们就大多在所到城市设立庄号,乃至批零兼营。”^①这实际上就是指明清以来客商的不断土著化,胡雪岩就是典型。

商人与近代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密切联系,并对近代杭州社会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杭州商人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对杭州商人本身的关注和研究上,应当把杭州商人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以杭州商人为社会坐标中心,在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中探寻它对周围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厘清杭州商人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对杭州商人与地方社会做跨学科的深入研究,以揭示杭州商人与地方社会的人口流动、职业结构、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公共建设、教育发展、社会救济、地方文化等方面的关联与互动。研究杭州商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对于揭示杭州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

一个传统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注定是一个步履维艰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近代杭州,商人是同早期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群体。商人无论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都努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在社会变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投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运业,使杭州成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之一。在近代杭州,商人是推动杭州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杭州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页。

转型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商人对近代杭州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近代杭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商人作为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个社会阶层，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社会阶层，是早期现代化的柱石。

近代杭州商人的崛起得益于三个因素。

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近代杭商崛起的地理因素

特殊的交通区位优势是商人兴起、商业繁荣的前提。杭州的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它是东南交通枢纽：大运河为南北交通大动脉；钱塘江与浙西、徽州地区联系；浙东运河与绍兴、宁波地区联系。杭州处京杭大运河南端，自魏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开始分离，经济中心不断南移，政治中心则在北方，两者以京杭大运河为纽带。在这种区位优势下，杭州商业不断巩固和发展。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 3000 余里。大运河自开通以来，一直是南北交通大动脉，对杭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近代以来，由于航道淤塞，其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功能在逐渐丧失，虽然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曾几度倡议治理运河，却均未付诸实施。但大运河杭州段的运输功能没有丧失。对于杭州而言，大运河的交通运输功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功能，一个是大运河作为区域交通通道的功能。从元代贯通京杭大运河后，真正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直通也只有 600 年左右，在整个运河 2500 年的历史中占不到 1/4。江苏和浙江的运河河段，因

水量充沛,一直担负着航运功能,因此大运河的区域交通功能始终存在。而且,随着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大运河的交通运输功能得到了加强。

内河交通方面的另一干线是浙东运河,它西起萧山西兴,经绍兴、上虞,东到宁波入海,横贯宁绍平原,连接钱塘江、余姚江、甬江诸水,自宋代以来,就是杭甬间重要的交通线。宋人姚宽称,当时“海商船舶,畏避沙浑,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①。明初,浙东宁绍温台四府人士“往来会城及南京各省”,也都由浙东运河前往^②。当时的浙东运河“舟行如梭”,“有风则帆,无风则纤,或击或刺,不舍昼夜”^③。以京杭大运河为干线的杭嘉湖地区,更是水网密布,舟楫称便。

杭州的交通区位优势,在近代没有改变,随着新式交通的出现,有了新内容。轮船航运业、铁路、公路的发展,加强了杭州的交通枢纽地位。

二、源远流长的经商传统,是近代杭商崛起的历史因素

自古以来,杭州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便利的交通,发达的传统商业,为近代杭州商人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杭州商品经济历来发达,特点是群众基础广,商人数量众多。产生商

① (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

② (明)任三宅:《修萧山北海塘议》,《两浙海塘通志》(卷19)。

③ (明)王稚登:《客越志》。

人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最基本因素，即“人多地少、本地谋生困难”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促使人们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谋生；其二是特殊的原因，如经商的社会示范效应影响等。杭州经商条件优越。历史上，徽商、晋商，经商是自然条件的逼迫。浙江台州、温州、义乌，地少人多，自然条件促使人们经商，宁波也是地少人多，加上沿海地区，有经商传统。杭州商人有自身特点，不是为生活所迫，经商是自觉选择；其三是人们的从众心理。

隋唐时期，南北经济得到交流，杭州是大运河的终点，成为东南交通的枢纽。“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①。唐代，在杭州历史上是继往开来的时期，也是杭州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杭州是“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又是对外贸易的港口。“併墙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都市。据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记载，宪宗元和（806—820）时，杭州每年税钱达 50 万缗，其时全国一年的商税为 1200 万缗。杭州商税竟占全国商税的 1/24，其商业发展可见一斑。^② 杭州的经济，至唐中后期已经相当繁荣，其繁荣的背景是整个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同时也成为江南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宝十四年（755）至广德元年（763）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北方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③。而江南地区则相对安定，大量北方人纷纷南下避难，增加了江南的劳动力，使得江南地区的经济保持了迅速增长的势头，甚至连北方起码的生活必

① （唐）魏徵：《隋书》（卷 31），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895 页。

② 李志庭：《浙江地区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2 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20）《郭子仪传》，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280 页。

需品也大多依靠江南,故有“天宝之后,中原释来。辇越而衣,漕吴而食”之说。江南地区也因而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地,所谓“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①。而江南浙西地区乃左右“国之盈虚”之地。繁荣的商贸经济在这一地区孕育了许多繁荣的商业城市,杭州则是其中之一。

吴越国时,“钱唐富庶,盛于东南”^②。唐、五代是我国对外丝绸贸易从陆路转向海路的历史时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发展的时期。海上贸易非常发达,杭州是当时重要港口。“闽商海贾,风帆海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杭州的贸易对象除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外,还有大食、交趾、占城、丹流眉、真腊等。

两宋时,北方的贸易港为辽、金所占,海外贸易港就不得不转移到浙江。朝廷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全国各地出海的商船都必须向设在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办理手续,可见该处市舶司在当时所占地位的重要。

南宋时期临安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是国内外各种商品集散市场。临安的粮食,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南、两广等地,从北关进入。柴炭竹木来自严州、富阳,也有来自衢州、徽州,“聚于江下,由南门而入”。至于蔬菜多来自东门外,因此,当

① (唐)李观:《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文苑英华》(卷803),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896页。

②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12页。

时临安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谚语。市内拥有许多作坊、质库、酒楼、茶坊等，交易非常热闹。除日市以外，还有夜市和早市，万物所聚，应有尽有。不仅城内商业繁荣，城郊的一些市镇，也是“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①。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各种番品南货珍异饰物，源源运至临安。南宋时“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②。由于统治者对海外贸易采取鼓励政策，注重市舶之利来扩大财政收入，因而促进了外贸的繁荣。

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各大商帮汇集之地。安徽、山西、广东、福建、陕西等地商人纷至沓来，而江浙本地的商帮如浙江的宁波、嘉兴、龙游、杭州及江苏的洞庭、句容、常州等地商人亦相当活跃。^③杭州是江南的繁华都市。明成化年间，杭州地区就“物产之富……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④。万历年间，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杭州地区“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金大见，珠儒雕口，诸藩毕萃，既庶且富”^⑤。城内可谓百货萃集，“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⑥。

① 吴自牧：《梦粱录》（卷1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851页。

③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238页。

④ （明）陈让、夏时正等：《成化杭州府志》，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卷首，夏时正序。

⑤ 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万历杭州府志》（卷33），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47页。

⑥ 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7页。

清代杭州,“闽商海贾,吴楚燕齐秦晋百货之交集”^①。工商业地位日益重要,商人群体成为城市人口中的重要组成,故乾隆时有“杭民半多商贾”之谚^②。“杭州在清康熙年间仅城内就有寿安坊市、清河坊市、文锦坊市、塔儿头市、东花园市、惠济桥市、褚堂市、花市、布市、米市、菜市、瓦市等13个场市,仁和县有场市38处”^③。集市大多在集市贸易中迅速发展,商贾聚集,货物集散量大,逐步形成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市镇。杭州城外就有塘栖镇、临平镇、笕桥镇三大市镇。

三、西器东来的外部冲击,是近代杭商崛起的时代因素

费正清提出“冲击—反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这种变动和转型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外发的压力”,即西方的冲击。不可否认,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初动因考察,这一模式具有理论价值。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冲击,与其说是西学的冲击,不如说是西力的冲击。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18世纪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④“冲击中国的西方文化在基调上是工业的,这个工业性的西方文化逼使中国的社会

① (清)吴允嘉:《康熙钱塘县志》(卷三),《里市》,中国方志集成本。

② (清)邵晋涵:《乾隆杭州府志》(卷五二),《风俗》,中国方志集成本。

③ 陈学文:《明清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④ 马敏:《有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21—27页。

结构、文化价值解组与崩溃”^①。“使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霎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②。通过对比中西的情况，人们意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主要在于较早地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商之所恶，官必去之；商之所好，官必成之”^③。中国如欲图强，也必须实行重商主义，大力扶持商人，振兴民族工商业。“为今之计惟有保商、护商、自重其商，或籍商人以助国势”^④。近代杭州商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崛起。有学者认为，在19世纪中国的沿海地区，出现了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大规模商业变化，因此把这场变化称为“商业革命”。近代杭州经历过商业革命，商业化带动了现代化，影响了其他行业。

通商口岸是西方国家武力胁迫的产物，口岸贸易以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关税税则为条件，是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基本形式，在政治上应该否定。但是市场自有其内在的运行方式，相对于旧的传统经济模式，近代口岸贸易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力量，尽管只是一种“外生变量”，但这一变量一旦进入传统经济领域，便会作为变迁因素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使经济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影响所及，将会在流通、消费、需求诸方面产生新的因素，带进新的刺

①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化》，重庆出版社1978年版，第22页。

② 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页。

③ 《申报》，1900年2月15日。

④ 《申报》，1903年2月10日。

激、从而打破原有的平衡与停滞,改变既有的模式,并最终导致经济发生一系列深刻变迁。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开放过程中发展的,不断地从相对封闭走向相对开放乃至全面开放,这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与客观规律。杭州成为通商口岸后,杭商抓住西方冲击的机遇,勇敢迎接挑战。

近代杭州商人的崛起,是多因合力的结果。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近代杭州商人占据区位优势;源远流长的经商传统,是近代杭商崛起的历史因素;西方的冲击,为近代杭商的崛起提供了时代契机。

第一章 商人与近代杭州工业化进程

近代杭州工业化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涉及的问题很多,资料既零散又非常缺乏。近代杭州工业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其最大特点是商办小企业众多,官办企业不多。商人在杭州早期工业化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商人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新式工商企业的创办与经营,使杭州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节 杭州近代工业发展概况

杭州的工商业历史、地理、资源等条件,使近代杭州成为一座以轻纺工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城市。近代杭州的工业,主要有缫丝业、丝织业、棉纺业、棉织业、针织业、漂染印花业、造纸业、制皂业、卷烟业、洋烛业、火柴业、印刷业、电器业、铁工业、自来水业等组成。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时,杭州的工业资本总额居全国第五